

目 录

第一章 总报告	1
第二章 高等外语教育教学	6
第一节 英语	6
第二节 俄语	33
第三节 德语	42
第四节 法语	50
第五节 西班牙语	59
第六节 阿拉伯语	71
第七节 日语	79
第八节 朝鲜语	90
第九节 欧洲非通用语	100
第三章 基础外语教育教学	112
第一节 基础英语	112
第二节 基础日语	123
第三节 基础德语	133
第四章 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	144
第一节 高校外语教师	144
第二节 基础外语教师	159
第五章 信息技术与外语教育教学	172
第一节 信息技术应用	172
第二节 网络外语学历教育教学	185

第一章 总报告¹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中国外语教育21世纪以来所经历的最不平凡的一年。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极为严重的这一年，我国外语教育界的广大同仁共同应对了诸多挑战，也取得了可喜成绩。本章首先重点评述疫情期间在线教学的宝贵经验及尚存的问题，之后对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中的具体问题导向提出建议并进行阐述，最后从国家战略、文明交流与传承、个人发展三个视角剖析外语教育的目的和成效，以期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总结“十三五”规划期间的成绩与问题。

一、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

2020年上半年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均实施了线上外语教学，学生居家学习，课程不中止，教学不间断。全国外语教师付出巨大努力，克服众多困难，在短时间内实现全学段的外语课程转移，规模大，效率高，实属不易。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我国外语教育领域的管理者、研究者、实践者从仓促“应战”到平稳过渡，从基本建设到质量提升，针对在线外语教育教学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积极探索和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初步形成了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在线外语教育教学体系。

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存在的问题，并展开深入分析。在疫情期间在线外语教育教学反映和表现出的问题中，最深刻、最可能产生长远影响的或许并非在线教育教学本身所带来的新问题，而是原有的、长期存在并困扰学界的难点问题。首要难点便是学习评价问题。评价是教师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在学习前、中、后对学生的学习过程、成果、困难、障碍进行考查和判断的教学环节^[1]。在线教学条件下，学习评价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受到冲击。第一，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学习行为和学习心理进行观察和跟踪比较困难，短

1 本章作者：王文斌、徐浩，北京外国语大学。

期内非常需要选用其他替代方式来获取这样的数据。例如，学生在学习一篇课文时，对内容进行深度理解的活动往往不是一过性的，而是需要若干环节组合在一起才能达成。但是，这些环节并非简单拼接起来的，而是一环扣一环、依次进行的。换言之，如果前一个环节没有顺利达成，后一个环节便很难进行。而在线教学中环节性评价的开展通常是较为困难的。第二，教学、学习媒介和方式的转变需要教师部分地重新匹配教学目标和评价手段，有些原有的评价手段或许已不能再有效评价某些目标的达成情况，而有些新涌现的评价手段则为评价某些目标的达成情况提供了新的途径。第三，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明显，各评价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也越来越丰富——教师、学生、家长、人工智能等各种评价主体如何参与且应当如何参与评价过程，成为在线外语教育教学中的新问题。关于上述涉及学习评价的三个方面，目前的研究都还不够充分，需要学界加紧跟进并有所突破。

在线教学过程体现出的第二个难点是“老问题”，即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差异大且学生可及的各种社会资源极度不平衡的问题^{[2][3]}。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差异很有可能因在线教学造成更大的学习成果差异，资源不平衡的影响也可能进一步扩大，最终给外语教育公平带来更大挑战。因此，我们建议学界更加关注这些难点问题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作好实地调研和规划研究，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难题的攻克尽早提上日程。

二、具体问题导向的外语教育规划

2020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过去的五年间，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蓬勃发展，产出了一批开创性成果^{[4][5]}。以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学科基础开展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实质性地提升了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规划意识，并建构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不少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揭示了中国外语教育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并指明了应对、解决相关问题的大方向。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和现实问题，通过理论思辨和现状分析，揭示问题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缺乏针对中观和微观问题的实地调查与跟踪观

察。这使得一些很有深度的研究无法联结外语课程与教学实践——既不能接受实践检验，也很难直接改善实践。例如，关于基础外语教育师资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提出过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论述专业素养构成及其培养方略的著作、论文也并不少见。然而，具体到师资队伍哪里“弱”以及如何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恐怕就没有那么多的实证研究和具体方案了。再如，关于高等外语教育增设、建设非通用语种的规划研究，也更多着眼于国家战略、发展意义和整体布局。具体到师资如何选用、资源如何配置、人才如何培养，全盘性的指导仍比较缺乏，导致在各校的具体建设中，自发性、随意性、波动性都很强。因此，结合具体情境、具体条件、具体过程的中观和微观规划研究亟须加强。

因此，我们提出四点建议，倡导“具体问题导向”的外语教育规划研究。第一，切实加强实地研究，充分意识到并重视具体外语教育情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具体情境既复杂又多变，因此不能仅通过以往经验推论将来应当如何发展；应当更谨慎地检视从实证到结论的逻辑论证，不应仅将实证数据作为支持某种预设论点的工具。第二，重视实证，根本是要改变规划研究的出发点，即外语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而非类型问题。很多类型问题是表象性的，甚至是基于流行概念传播出来的，并非真正基于科学论证归纳出来的。因此，当下特别需要回归到具体实践中重新发现具体问题，重塑类型问题。第三，要尽早规划、建设更多的基础性数据库，以支撑科学的规划研究和长期的发展分析。我们目前有不少数据库是应用型的，即针对某一特定用途建设的；而开展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更需要基础性数据库，要采集、收录、维护能支持深度描述的数据。第四，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也应考虑建构评价机制和方法。规划研究的价值在于启发、指导、规范实践，而实践的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或归咎于规划。因此，对规划研究本身开展评价，能够有效促进规划研究质量的提升。

三、外语教育的目的和成效

每到每一个五年规划临近结束时，都应盘点成果、评估成效。同外语教育规划研究一样，外语教育本身的成效分析也应得到更多关注。评价外语教育的成

效，应该先进一步明确外语教育的目的。而外语教育的目的是多维的，应当综合、立体、历时地进行考察。首先，应当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把握外语教育的目的^[6]。国家战略视角下的外语教育不仅应关注外语人才的培养，更应关注外语教育作为全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换言之，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量外语教育，既要明确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外语人才，也应厘清外语教育对国家所需各类人才培养的意义和价值。在外语界，尤其是高校，似乎更重视外语人才和人才外语能力的培养，而关于外语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上位意义探讨得还不够充分。当然，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但其中的很多主张往往脱离外语教育的核心内涵和内容，单纯偏向其他素养的培养。总之，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讲，我们既不能只谈外语人才培养，用它涵盖外语教育的全部目的，也不能仅仅借由外语教育去实现人才培养的非外语内涵，偏离了外语教育的本身内容。

其次，外语教育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传承。外语也是语言，承载着他者文化，也传播着外语使用者自身的文化。因此，应当从文化交流与文明传承的角度审视外语教育。那么，考察外语教育是否达到了这个层次的目的，需要更具体地评估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传承——走出去了什么？引进来了多少？保存了什么？延续了多少？这些都应当是评价外语教育成效的重要问题，但目前来看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系统研究仍然不够。也就是说，我们在理论和理念上珍视和倡导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传承，但并未有过梳理和“盘点”，也就无法有力地证实外语教育的成效。

最后，外语教育对每一个个体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我们对外语教育给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个体所带来的益处和价值，似乎也缺乏全面、分层、长久的考察。很多致力于外语教育事业的从业者及支持外语教育发展的普通人，似乎都不能很好地、全面地具化外语教育对个人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和不可或缺性。学习外语、掌握外语除了获得某种资质，作为入场券进入某一阶层或领域^[7]，还会给个体带来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个问题对于从个体角度对外语教育成效进行评估至关重要。总之，不论是国家战略、文明交流与传承还是个体发展的视角，我们都应当更加系统、严谨地审视、研究外语教育的成效，以更明确地回应外语教育目的是否达成的命题。

四、《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十周年

迄今为止，“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简称“年报”）系列蓝皮书已连续推出十年。编写这份系列报告的初衷是按年度记载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状况，力求既全面又重点突出地对外语教育各个领域的事件、活动和发展进行描写和总结。最初的几年间，编写这样的现状报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种尝试。这项工作覆盖范围大，涉及内容广，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编者在整个编写过程都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幸运的是，我们的这项工作始终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关心，得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英分社的帮助，更是得到了编委专家的鼓励、协助以及全体作者的无私奉献和全力支持。

这份年报既是年度重要资料、数据、事件、信息的记录，同时也是外语教育各领域经验、教训的回顾和总结，更是一种分语种、分学段、分领域的年度性研究。这份年报记载着中国外语教育点点滴滴的成长，也承载着中国外语教育界携手奋斗的共有记忆。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一百年，我们将延续有效做法、传承重要思想，不断调整、不断改进，努力将年报做成更全面、更有深度、更有史料价值的一份年度文献。

-
- [1] Davison, C. & C. Leung. 2009. Current issue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based assessment [J]. *TESOL Quarterly* 43: 393-415.
 - [2] 徐锦芬, 2014, 《中国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和影响因素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3] Lareau, A. 2002. Invisible inequality: Social class and childrearing in black families and white familie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747-776.
 - [4] 文秋芳、张天伟, 2018, 《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5] 王文斌, 2021, 对外语教育中国化的思考 [J], 《中国外语》(1): 20-21.
 - [6] 曾昭唯、张玮、王晓涵, 2021, 高中英语新课标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缕析与建议——专访《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修订组组长梅德明 [J], 《英语学习》(1): 4-14.
 - [7] Xu, H. 2019. Putonghua as “admission ticket” to linguistic market in minority regions in China [J]. *Language Policy* 18: 17-37.